

盛天任 著

# 魔幻涅槃行

——我的自传



(1922—2010)

一载仍多病  
三年未解兵  
感时伤逝水  
历乱认前程  
卧倦抛长卷  
歌终忆旧盟  
何当展双翅  
飞梦到延城

——作者

(十八岁时诗作)



九歌书坊  
2010年7月

# 历乱认前程

盛天任 著

# 历乱认前程

著作人：盛天任  
出品人：洪仪征  
编 辑：盛小红  
制 作：九歌书坊

---

2010年7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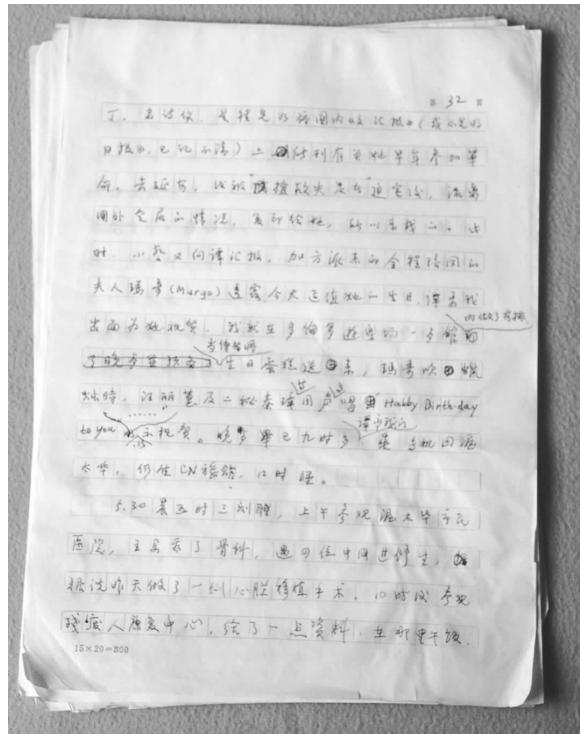
浪淘沙 溪水

溪水诉潺潺度壑穿山云深雾重万千湾  
激浪飞花终有信迎得潮还碧玉泻平滩  
彩照尘寰奔腾应识远征难且喜涓涓流不尽何必狂澜



# 大任

我跟老伴是十同：同年、同月、  
同时辰、同乡、同学、同事、同志、同  
战斗、同患难、同安乐。



### 《我的自传》的部分手稿



家乡岳王镇的镇志（左），  
我也参与的革命者口述历史专集  
《重温激情岁月》。

## 目 录

---

一、从读《志》琐忆开始	1
二、战斗在第二条战线	25
三、解放后的十年	62
四、南艺五年	77
五、两期“社教”及“文革”	88
六、重返领导工作岗位	112
七、环球旅行追忆	143
附录一：盛天任同志生平	166
附录二：告别辞（盛宁）	170
附录三：为了忘却的回忆（盛宁）	175

# 一、从读《志》琐忆开始

1996年9月中旬，太仓市岳王镇镇志办公室寄来一本《岳王镇志》，翻阅之后，见我家四代人的名字均列其中，勾起了许多儿时记忆。适宁儿自庐山折道来宁探视，为其略谈一二。他幼时曾在岳王老家住过几年，以后又回去过一次，但对所谈之事却全不知晓。他建议我将所知所忆的情况写出来，以使儿孙辈能知道一些祖先的情况。现即执笔为此琐记。

## (一)

该《志》第450页“人物”篇称：“本志根据人物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，兼顾其功过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，从旧志及有关资料中，选出古代人物十人，已故近现代人物八人，共18人予以立传。”在第一章“人物传略”第二节“近现代人物”中，第一位即为我曾祖父的传略。因字数不多，摘录如下：

盛庆澜（1842—1910）字鹤九，清同治元年（1862

年)由邑城移居鹤市,以200文作本,初贩旱烟,后开南货店。由于艰苦创业,勤俭持家,生意日趋兴旺。亦精医术,遇贫苦人治病,不收酬金,药费也可赊欠,乡人都称“盛好人”享年68岁。

我幼年时经常听祖母谈起曾祖父的情况,但他的大名——盛庆澜和乡人称誉他为“盛好人”则从未听说过,是这次看到《志》后第一次才知道的。我只听说人们称他为“鹤九公”。听祖母说,曾祖父原在太仓东门外一家南货店当学徒,有次被老板无理责怪,一气之下,向东出走到了岳王,身上只带了二百文小钱。一“文”小钱价值多少?现在已无法想象。在我记事以后,见过这种外圆内方的薄片铜钱,但已不通用,通用的是“铜板”,中间没有方孔。而是铸有“当十”字样,也就是说,一个铜板即是十个小小的钱,二百文即是二十个铜板。但又不能这样比,因为物价比值不一样。总之,二百文是个很小的数目,曾祖父即以此作为本钱,开始摆烟摊,以后逐渐扩大,经营南货店,不断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。因为在手上,不但盖起了一座三间宽、四“进”深,其中一“进”为楼房的深宅大院,而且还购置了三百石“单租”田,这些产业,后来传给了后代,成为镇上新崛起的一族。

## (二)

曾祖父精于医术,但没有听说师承何人,估计是属于“自学成才”的。据该《志》“医疗卫生”篇“私人诊所”一

节记载：“清同治年间，盛庆澜迁居鹤市，后开业行医，因其医技精湛，且遇贫病不收酬金，还代给药资，乡人称誉为‘盛好人’，其子德钟、德铭继承父业。”看来他在兼营南货店的同时，是正式挂牌开业的，并把他的医术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。曾祖父一共生了四个儿子。老大小时夭折。老二德钟，就是我的祖父，是位开业的中医。因他中年早逝，据祖母说，当时我父亲才十二岁，所以我未曾见过。老三德铭，也是一位开业的中医，我小时候，见到过他挂在家门口的黑底金字招牌，写明是“内妇科大方脉”。但好像找他的病人已不太多了。他的医术没有传给他的三个儿子，而是传给了他的女婿，名叫陆美若。陆美若传给了他的养子陆济群，这在《志》书“私人诊所”一节中，都提到了他们的名字。曾祖父还有一位小儿子，叫什么名字已不记得了，没有学医，也死得很早。德铭公的大儿子，我叫他“甘伯伯”的，他好像小时候也学过医，但没有学下去，后来弃医经商，开了一家药店，有时也有乡人来问病买药，他只能根据《汤头歌诀》抓几样草药卖给他们，主要是卖药，已经不是正式的医生了。

### (三)

曾祖父去世前，几个儿子就分了家。因为老大早夭，我的祖父德钟一支就成为“大房”，尽管他的字是“仲英”，“仲”字保留了“老二”的痕迹。德铭一支则为“二房”，我叫德铭为“二公公”，还有我未曾见过的“三公公”一家为“三房”。那三百石“单租”田，三一三十一，分给了三家，每

家一百石。所谓“单租”田，据《志》书解释，是佃户向地主买了田面租种权，田面价占田价的50%，佃户买了田面租种权后，每年仍须缴纳地租，不过比“双租”田缴的少一半罢了。“石”是田亩的计量单位，据我祖母告诉我，大约一石二斗合一亩地。所以一百石大约等于八十多亩地。分家以后，三家就出现了分化。二公公家人口多，生有三子二女，除长女嫁给陆美若（前已提到的中医）外，将田地分为四份，三子各得一份，幼女依父母得一份，也就是说，每个小家有地二十亩左右。他家的老大（我叫他甘伯伯）把地卖掉以后作本钱开了药店。他家的老二（我叫他霖伯伯）将地收回自种，后来出去当米店伙计，地由霖妈妈及其子女种，间或请些短工，有时也给人家做短工，解放后土改时大约划为下中农。他家的老三（我叫他保叔叔）学会了抽鸦片，有时还参与赌博，把祖上传下来的田地几乎卖光了，所以成了贫农。三公公家的田地据说也早卖光了，原因不详。我记事时，三公公早已亡故，他的儿子（我叫他龙伯伯）在家门口摆了米摊头，每天进出少则几斗，多则几担，也经营麸皮、米糠等饲料，看来属于小本经营，日子过得尚可温饱。我们家祖父早死，由祖母持家，将我父亲抚养大，靠收租为生，积累所得，就放贷出去（月息二分，即贷出100元，一年收回本息124元），盘剥所得经常买进一些田亩，家道日益上升，据我的印象，抗战前夕（我家全盛时期），大约共有“单租”田七百多石，另有“双租”田几十亩，放出的贷款，已陆续收回，作为买宅基地和建房之用，还存有数千银元，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，在镇上已是个中等偏上的地主了。

## (四)

我的父亲名世程，字雪门，小名瑞。在我们家乡，一个人一般都有三个名字：一生下来取的叫小名，也就是乳名；稍后取一个大名，又称官名；再一个就是“字”，也有叫做“号”的，是在成年对外交际时常用的，而在正式场合则必须用大名。大名都按家谱规定的顺序排列，如我的祖辈是“德”字排行，我的父辈是“世”字排行，我自己这一辈则是“大”字排行。一看排行，就晓得你的辈份。解放前新疆有位省主席叫盛世才，解放后，新华社有位驻莫斯科记者叫盛世良，虽都和我家无亲无故，但从取名的排行看，应该和我父亲同辈。

我祖父在世时，亲自教我父亲读书，却没有将医道传给他。到祖父去世，父亲已读完《鉴略》、“四书”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等书，以后没有听说拜谁为师，主要是继续自学，有时向年长的有学问的人请教，如吴采芝、许泰（颂和）等人，亦师亦友，切磋学问。他特别喜爱文学诗词，吟咏不辍。20年代常熟有个“虞社”，聚集了一批文人雅士，不定期出刊一本诗文集，就叫《虞社》，我父亲常去投稿，时有刊登。我出生以后，他办了一个私塾，收徒讲学。记得所收学生有毕听彝、张欣和、曹燕林（后名曹俊才，开义昌布店，抗战初起，我曾在他店内当学徒半年）、夏曰书（后来是我的妹夫）、胡庆球等。我当然也在其中，受到启蒙教育。这个私塾就设在我家大厅上，前后收学生多则十余人，

少则七八人，平时不收学费，到年底收受红包，上写“束脩”或“敬仪”字样。当然，我家收入主要是靠收取地租和放债的利息。

我父亲自从开馆教学以后，成了“先生”，所收学生一般均为商贾子弟，加上家道日隆，因而跻身于乡里的绅士之列，逐渐走上了从政的道路。我小时候，曾听说过他曾竞选过县“议员”，是否当上，具体情况就不太清楚了。

### (五)

1927年（民国16年），岳王乡成立行政局（此前为乡自治公所，领导人称为乡董），我父亲担任了行政局局长（见《志》书大事记16页），大约相当于以后的镇长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事先曾和多人商议过。参加的记得有金耀先（镇上有名的乡绅）、陈维安（棉花行老板，兼营油坊）、胡友鹤（以上三位是我父亲的长辈）、胡斗南（二胡为老、新胡益茂酒坊老板）等人。先是我父亲推让，要金耀先担任，金则以年老为由，认为还是年轻人出来干为好。议论的焦点是从岳王的市面来看，西街比较繁荣，应由西街的人出来担任。当时岳王市杨家弄以西市面繁荣，酒坊茶馆和较大的商店均在西街；杨家弄以东则除“嘴角”周围稍有集市外，其余大半条街平时均冷冷清清；北街上则除典当外，一家商店也没有。商议的结果是由我父亲出任，大家都表示支持。还有开店的老板如夏曰耀（开南货店，夏曰书之兄）、张馨如（张欣和之父，开猪肉庄），均为我父亲的挚友，店铺也都在